

天地史譚

葛劍雄 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天地史譚

葛劍雄 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地史谭 / 葛剑雄著.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 - 7 - 5326 - 5096 - 5

I. ①天… II. ①葛…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2921 号

天地史谭

葛剑雄 著

责任编辑 刘寅春

装帧设计 黄 骏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7.25
字 数	492 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6 - 5096 - 5 / K · 1099
定 价	10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 021 - 66511611

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

——我的史学观

我没有上过大学本科，所以没有修过“史学概论”或“史学思想”一类课程，只是在中学的政治课上学过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在1978年以前我的业余兴趣也颇广，历史只是其中之一，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以历史研究为自己的专业。真的读了研究生，得了学位，当了教授，从课程到课题，论文到专著，国内到国外，虽然始终忙忙碌碌，并且早已忝为人师，在向我的研究生讲史学了，史学理论书却没有读过几本。因此在接到稿约时既受宠若惊，又惶恐不安：我配谈史学观？我也能谈史学观吗？

想了几天，倒慢慢有了点自信。有没有资格或者能不能谈史学观，首先是有没有史学观。有的就能谈，至于谈得好不好、对不对是另一回事。搞了十几年的历史地理和人口史，多少写了些文章和书，个中滋味固然只有自己知道，但印出来的东西却是有目共睹的，实际上别人早已在评判，要躲也躲不了。1989年发了一篇谈“炎黄子孙”的文章，不是到去年（注：1996年）还有一位年

轻人在某学报把它批为“民族虚无主义”吗？你不懂什么“主义”或“论”，却免不了让别人用“主义”或“论”来批判你。看来只要一搞历史研究，史学观是免不了的，尽管往往并不自觉。既然如此，倒不如将自己这些年在研究中产生的想法谈出来，至于是不是对，那就让别人去说吧！

一、有没有真实的历史

由于多少读过点书，所以未进大学前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小说等文学作品可以虚构，而历史是不能虚构的。因而对历史书上说的，总认为是正确的，至少事实是没有问题的。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他们搞影射史学、篡改历史的阴谋遭到揭露，我也还以为这些只是与现实政治有关的一些方面的特殊现象。可是等我成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尤其是当了谭其骧先生的助手以后，才发现包括这门介于人文和自然之间的、比较中性的分支学科在内，要写出真的历史竟然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以前我对唐朝疆域的概念是西起咸海，东至朝鲜半岛，北抵贝加尔湖，南达越南，这来源于包括中学课本在内的各种历史书，也直接显示在一本“内部书”——《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的地图上。我还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三国时孙权就派卫温等到过台湾，元朝时设置了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1980年年底，这些概念在一夜间被否定，我得知地图集的主编、我的导师谭先生已经起草了一份修改提纲，这两项都是必须改正的内容。原来唐朝从来没有同时拥有过如此辽阔的疆域，尽管这些地方确曾经是大唐帝国的兵威所及。如当龙朔二年（662年）唐朝的军队进抵咸海之滨时，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但总章元年（668年）末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时，西界已退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孙权派兵去台湾是为了掠夺当地的人口，结果是得不偿失。元朝的澎湖巡检司只是福建同安县的派出机构，显然不可能管辖

台湾,文献上也从来没有找到过任何证据。

谭先生提出的建议,一是把地图集上所有的总图都改成按同一年代而绘的,而不是把不同年代的形势合在一起以拼凑出一个极盛疆域来;一是台湾在清朝设府以前不应被看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应在图上采用中国的基色,但不同于大陆上的政权。前一条很快得到了领导部门的批准,并在公开出版的《图集》上实行了;后一条却遇到了种种阻力,历经反复,直到1986年《图集》的第7册(元明时期)仍然无法出版。所幸在谭先生的坚持下,有关部门广泛听取了学术界的意见以后,终于取得中央领导批准,使《图集》的7、8两册最终按此方案出版。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反对谭先生意见的人中也有颇具声望的史学家,而他们的论据却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政治”或“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历史(包括历史地理)研究要为政治服务,要有利于国家,当历史事实不利于“政治”或“国家利益”时就可以加以修改、隐瞒,发表不符合实际的“历史事实”。从我所听到的话分析,除了现实的需要以外,他们的理由似乎有两点:外国的史学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历史事实本来就讲不清楚,你能这样说,我为什么不能那样说?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的惊其实有点大惊小怪,因为如果除去这种观点的功利因素,史学界并不乏这样的看法:尽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但任何人记载下来的历史都不能避免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的影响,其他人的理解和研究同样如此,因此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观、真实的历史。由此引出的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以论带史、先论后史、古为今用等论点,曾经在史学界占尽风骚,今天也还是一些学者的信条。至于是不是有人认为连历史事实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我还没有听到过。

如果说这种观念导致的不真实是人为的,是符合某些人的主观意志的,那么另一种不真实却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水平和认识能力所无法避免的。

我从1979年开始研究西汉人口问题,以后又扩大到其他时期。在我进入中国人口史领域之初,我把问题看得比较简单,甚至以为梁方仲编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已经提供了基本的数据。但稍微深入探索了一番以后,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中国历代的户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等于人口数,甚至与实际人口数毫无比例关系,在研究当时的人口数量时往往只能作为参考,但除此以外很难找到能用作定量分析的史料。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可以肯定传统的“人口数”(即户口数)并不是实际人口数,却无法知道准确的数字应该是多少,提出了一个具体数字(包括我自己提出的)也不容易找到验证的办法。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原有的结论,包括自己曾下过的结论也会不断被修改。但修改后的结论是不是更加准确、更加真实,往往也难以得到证实。例如以前的学者根据明朝的户口数把当时的人口数定为五六千万,何炳棣在1959年出版的《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推断明朝的人口高峰可能达1.5亿,我在《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提出明朝人口已经突破2亿。当然我至今还认为自己的结论更符合实际,但我不敢说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这毕竟是出于估计。

我相信在史学的各个分支、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这样的例子不会是个别现象,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复原历史的真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不过这两种不同的情况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前提——历史本身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唐朝的西界最远到达了什么地方,延续了多久,本来只有一种答案,无论我们今天是否还能了解,或者我们了解了以后是否愿意承认。明朝的某一时刻在某一空间范围内(例如明朝的疆域内,或者今天中国的范围内)存在的人口数也只有一个数量,无论当时是否统计了出来,或者我们今天是否推算了出来。红学家们最近又在争论曹雪芹死在哪一年,但只要以前真有过曹雪芹这个人,那么他死亡的时间就只有一个,既不可能有一个以上,也不可能没有,无论今天的红学家如何做结论。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

二、我们是否需要真实的历史

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情况,显然并不涉及这个问题,因为就研究者的主观愿望而言,是完全希望复原历史的事实的,只是限于现有条件做不到而已。即使他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也不是明知故犯,而且一旦他们意识到了就会及时修正。

第一种情况就并不是如此,因为尽管研究者不见得完全掌握了真实的历史,但至少已经了解了更多、更真实的事实,可是出于种种考虑却故意隐瞒或曲解了这些事实。就我所知道的原因,无非有这样几种:

一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如《图集》内部本将不同时期的疆域拼凑成一个“极盛疆域”,是为了显示中国从来就拥有辽阔的领土;无论何时,中原王朝的边界都要画在长城之外,至少要比长城更外一些,是为了证明长城绝不是中国的边界;从秦汉时就要将台湾和大陆画上同一种颜色,是为了突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一是为了符合某种理论或主义。像明朝的户口数字,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问题,但明朝中后期户口数长期停滞的“事实”正好被用以证明封建社会的穷途末路、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农民遭到残酷剥削,甚至可以看成是闭关锁国、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抑的证据,怪不得有人到今天还置我们的研究成果于不顾,津津乐道于明朝的“人口”始终徘徊于五六千万的“事实”。至于某些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打上引号的理由是:这些“主义”往往不见于马克思的原著,或者只是马克思的个别词句,显然称不上他的主义)或者哪位权威学者的观点,即使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也只能说是地主阶级(好在中国历史上能留下记载的几乎都可以称为地主阶级)的造谣污蔑,或是研究者本人别有用心

所致。

一是强调为政治服务,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有些事实或结论,私下或内部也可以承认你是对的,或者也知道是站不住脚的,但据说如果如实公布就会不利于国家,影响政治,所以必须按假话说下去。《图集》内部本定稿时正值“文革”期间,画历代的中國疆域、包括各中原王朝的疆域越大越好,谁要根据史料提出应该缩小一些就有“卖国”之嫌,而主张尽可能大的都成了“爱国主义”。到80年代初尽管“文革”已过,有些人心有余悸或预悸,有些人则余毒尚存,所以对实事求是的修改无法接受,有人就问过:“画大一点儿有什么不好?”还有一位著名的前辈学者向各级领导上书,指责修订本自唐代至清代某段边界的画法对国家不利,是“卖国主义”。

这一理论往往被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几乎能适用于一切方面,至今还得到广泛运用,虽然结果可能令人啼笑皆非。如谭先生早在1942年就发表了《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见》一文(载浙江大学《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指出丁文江提出的徐霞客发现了长江正源是金沙江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问世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绳水(金沙江当时的名称),并且知道它来自遥远的汉境之外,流向东北方向后在今四川宜宾汇入长江。这本纪念论文集在50年代重印过,并不是什么秘籍孤本。可是直到80年代发表于国内最重要报刊上的文章或报道依然称“发现了长江的正源”为徐氏的“杰出贡献”,作者的理由大概就是,既然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拔高徐氏自然就是爱国主义了,此说对不对又有什么关系?我在《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中曾指出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所载先秦至汉初户口数不可信,以后又不止一次撰文论述中国最早的人口调查不可能始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至今我从未看到有提出证据加以反对的文章发表,但一些论著却继续在说这样的话。其中原因我不敢妄断,但在一次会上我倒亲耳听到了意见:“照你这样说,我国的人口调查开始得比其他国家晚,照原

来的说法从大禹时候开始不是很好吗？”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现成的“世界第一”不要，却要白白让给外国，岂不是对国家不利吗？

一是为了维持自己或别人错误的旧说，这类人本来就不多，其是非也不难判断，可以不必列入讨论了。

至于要说这种种原因是不是值得考虑，或者说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求真求实的前提，我想只能从历史研究的目的来认识。我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既然如此，就绝对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否则怎么可能得出准确的规律来呢？另一方面，在一种具体的规律被发现、被揭示以后，历史研究的结果也可以用于验证这一规律。如果不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或者对历史事实做随心所欲的取舍，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根本起不到验证的作用。如果这一“规律”并不是真正的规律，而是错误的，那这样的验证只能为错误披上正确的外衣，延续并扩大了它的消极作用。如果这一规律是正确的，也会因为采用了错误的验证方法、使用了不真实的论据而受到人们的怀疑。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规律，也不可能一下子被人们全面、深刻地揭示和认识，实事求是的验证可以发现存在的片面性或局部的误差，正是使之完善的恰当途径。

一种理论或主义，如果是真理，就不必害怕历史研究的检验，因为它必然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即使由于一时还无法找到充分的事实，或者真相被歪曲、掩盖而暂时不为人们所知，但规律的客观存在是不会改变的，难道它还要靠虚假的“历史事实”才能变得正确吗？相反，依靠迷信或其他欺骗手段、专制或其他暴力手段推行的理论或主义，由于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乞灵于捏造事实、造谣惑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用所谓的“历史事实”做附会迎合，都只能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我认为，历史事实、历史规律本身是无阶级性可言的，无任何国家、民族、

信仰的差别的。对唐朝向中亚的扩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人与波斯人、佛教徒与穆斯林、汉族人与非汉族人的评价可能会有差异,但唐朝向中亚扩张的事实是绝对无法改变的,它的西界到了哪里也是不能改变的。你可以认为这是爱好和平的表现,是必要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但你不能说唐朝的军队没有到过咸海之滨;你也可以评论为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但却不能说唐朝一直打到了地中海边。通过这一事实,不同的人完全可能总结出不同的“规律”,但真正的规律只有一种,或许已经包含在其中,或许还没有。如果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同一历史事件总结出来的不同“规律”居然都是对的,那么这还算是什麼规律?规律的客观性又何在呢?反之,如果他们总结出了同样的正确规律,那又有什么阶级性可言呢?

历史哲学是对历史规律的集中、概括和升华,更应该建立在严格的真实的基础之上。历史哲学虽然不能排除逻辑和思辨,但一种正确的历史哲学观的确立、完善并得到承认,却离不开大量的实证。我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敢多做恭维,原因之一就是其中对中国历史的引证往往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然,基本目的不是唯一目的,更不能代替具体运用中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但无论哪一方面的具体运用,坚持真实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

我把历史研究的具体目的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规律,第二是用于宣传教育,第三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信息,包括背景、经验等。

第一目的与基本目的并无二致,就像历史研究要运用其他学科的规律和知识一样,不能设想,如果这些东西是以虚假的、错误的论据为依据的,我们却能用之于历史研究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反之自然也应该如此。如我们研究的历史疆域范围可以为民族、人口、文化、艺术、语言、宗教、经济、贸易、政治、对外关系、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学科提供重要的根据,如某一民族的分布和迁移、某一地区的人口密度、某种方言的形成过程、某种宗教的传播范围等往往

与疆域的变迁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由此而决定的。要是我们在地图上画出的历史疆域是随心所欲的,或者只是为了表示“爱国主义”而尽量扩大了,相关学科以此为据的结论又岂能正确呢?又如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和分布,一般都能作为分析评估当时的气候、生态、地貌、灾害的指标或参数,在观测记录不具备、文献记载缺乏的条件下尤其重要。17世纪初的明朝究竟是有6000万人口还是2亿人口,对相应的结论不仅会有定量的影响,还会导致定性的差异。如果当时的人口真的比1600年以前的西汉末年还少,很多生态、地貌方面的特征就无法得到解释。

第二目的比较复杂,因为接受宣传教育的对象千差万别,每次宣传教育的具体要求又不一定相同,选择的内容和方式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同样是历史课,初中的和大学的不应相同;都是做报告,对一般民众与对党政官员、专业人员自然不能用一种稿子;国难当头时要多讲先人的英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不必同时说明历史上有过多少回委曲求全、卖国苟安;激励民心时就侧重于以往中国在世界的先进地位和伟大贡献,而不必大谈中华民族的弱点和历史上的污点;接待友好邻邦来宾时强调两国历史上的友谊,暂时不提也有过的冲突和战争;在某人的追悼会上主要谈他的优点和善行,而不将他犯过的错误一一列举。凡此种种,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这一切都是以不违背事实为前提的,只能是对各种事实的不同选择或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歪曲或伪造事实。例如我们对初中生,可以只讲唐朝的疆域最远曾经到过什么地方,对高中生可以说清唐朝不同时期的疆域变化,对大学生就应该分析一下唐朝开疆拓土的利弊得失;尽管详略不同,繁简有别,但基本事实应该是始终一致的。如果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不顾历史事实,尽管当时可能有效,一旦受众了解真相,就会连正确的宣传也不再相信,这样的例子以前还少吗?

第三目的最为某些人所看重,历史研究为现实、为政治服务一度被置于首位,因而这方面的功能被无限地扩大了。实际上,历史研究对现实或政治的直

接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历史永远不会重复,历史事实也不会雷同,任何历史经验都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实,任何历史财富都不会直接转化为实际利益。在国家和民族消亡之前,历史学者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一员,当然要爱自己的祖国,要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但如果他要用历史研究来为国家或民族服务,那就必须遵循历史学的原则,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在历史事实中找不到有利的论据,可以保持沉默,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倾注自己的爱国热情,却不应该伪造或歪曲事实。

就拿历史地理中最敏感的疆域研究来说,其现实意义显然是被夸大和曲解了。决定一个国家领土的大小和稳定程度的主要因素,是现实,而不是历史;而有直接影响的历史也只是最近的数十年,至多一两百年,绝不会牵涉到数百年或一两千年前的历史。今天中国的国界主要是最近这一百多年间形成的,对中国与邻国有约束力的条约都是在此期间签订的,在此以前的历史只是背景,至多只能作为参考,而不是依据。所以研究唐朝的疆域大小纯粹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更不会给国家带来直接的利益。把唐朝疆域尽可能画大只能满足一些人的虚荣心,不会使现在中国的领土扩大一分一毫,算不上爱国主义;就是画得比实际小了,也不会因此而使国家利益受到任何损害,或者使中国人感到低人一等,除非是此人本来就有不正常的心态。即使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画法,也只是历史而已。如整个唐朝都拥有今天越南的一部分,难道我们可以凭一份唐朝疆域图向越南索取领土?而当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却是唐朝的对手,难道我们因此就能对一小撮闹“藏独”的人不闻不问?即使是晚清和民国期间,导致领土丧失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历史,更不是历史学者的过失。沙皇俄国掠夺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不需要什么历史根据,日本强迫清朝割让台湾也不是由于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领土,而台湾之重归祖国靠的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因为历史学家论证了台湾的历史归属。

这样说并不等于历史疆域的研究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更不意味着历史学者可以不顾国家利益,或者不为国家保守机密,如果真的存在并有必要的话。例如,尽量为政府提供有利的历史依据,于我们不利而对方又没有掌握的事实,在一定阶段内应该保密或回避,对政府内部决策的意见暂时不公开讨论。这些做法也是以实事求是的研究为基础的,如果连历史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又怎么判断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呢?又如何能确定正确的策略和政策呢?如果连对方早已掌握了资料,甚至根本无密可保的史实都不予公开,除了愚弄一些国人以外又能给国家争到什么好处?

总之,就历史研究而言,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处于什么条件之下,对真实的追求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在运用研究成果时,可以有所选择或取舍,但还是以不违背真实性为前提的。那么,最终的问题是:

三、我们能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

必须承认,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就像绝对真理一样。而且历史科学有其自身的局限,它的研究对象只能是过去,而不是现在或将来。历史既是全人类的活动,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活动,而人的生命与历史相比是极其短暂的。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只要没有留下记载,他的行为和思想就会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永远消失,而留下的记载也会随着时间不断消失。例如,唐朝的边界在哪里,当时的开拓者、守卫者、当地居民、地方行政机构以至中央政府都是了解的,但在那些当事人死亡以后,后人就只能依靠直接和间接的记载了;如果当时没有留下记载,或者这些记载又在战乱中全部毁灭了,历史学者就会无能为力。即使是一个活着的人,对他过去的研究也得依靠记载(直接、间接的,自己的、他人的),而不是由他本人来重现。

当然,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为复原历史事实创造了一些条件,但在可以预见

的未来,再先进的手段都不能使历史重演,让历史人物复生,所获得的结果也是有限的。由于明朝后期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我们又没有办法为当时的人口补做普查,所以只能依靠文献记载来做估计。而研究现在的人口问题,不仅可以利用普查资料,而且能在需要时进行实地调查,对前一段时间的情况也能做回顾调查。当然通过现代人口统计技术,可以对以文献为依据所做估计的结果进行修正和检验,但在缺乏最起码的数据的条件下,要求得精确的结果是绝无可能的。至于一些本来就只发生在个别人之间的事情,如一位伟人在临终时究竟说过什么话,如果在场的人都未做任何形式的记录,要依靠什么技术手段来再现,显然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的能力。

与以自然界或不具有生命的物体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相比,以人类活动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涉及的范围要广得多,情况要复杂得多,具体对象也多得多,如对历史人物就很难严格分为多少类型,研究个性的重要性无疑要大大超过共性,特殊规律所起的作用也比一般规律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以我比较熟悉的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而言,前者更接近于历史学,比后者要复杂得多。

但是,真实的历史依然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因为离开了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就不能被称为科学。如果我们把真实理解为相对的、可以逐步接近的,对真实的追求就是可行的,并且会不断取得进步,使我们越来越靠近它。以天文数字计的历史人物、事件及其附属的各个部分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恰当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记载的缺陷和填补空白。秦始皇长的是什么样的胡须也是历史事实,如果真有人研究出个结果来也不是坏事,但不了解这一点,对确定他的历史贡献显然不会有什么影响,不能说不知道这一点就不真实了。明朝某一时刻有多少人口,是永远无法精确到个位数或万位数的,但即使在百万位数甚至千万位数上取得了可信的成果,也是向真实大大地靠拢了一步。

这样的追求还是一个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史学家在探索的过程中很可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或者误信了虚假的史料,或者受到相关学科的制约,因而会背离真实,甚至可能倒退。而一旦发现了,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回到正确的方向,而且对致力于求真的史学家来说,这样的过程只能更坚定自己的信念。

在开始中国人口史研究后,我产生了进入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岩洞的感觉,找不到出口在哪里,连入口的路也已不知所在了。但我深知坚持求真才能找到出口,无论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所以我愿用这句话来结束本文:

真实的历史:永恒的追求。

(原载萧黎主编《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目 录

1 /	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我的史学观
1 /	统一与分裂
3 /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
13 /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52 /	历史的启示：中央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
70 /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
88 /	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105 /	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读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和《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123 /	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
142 /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世界意义